

陆维钊的“笔墨处方”

——张立辰、姜宝林忆述恩师教学

■本报记者 黄俊娴

在“万山青拥——陆维钊艺术文献展”现场，记者在一幅《竹石图》下，见到了陆维钊先生的两位学生——知名画家张立辰、姜宝林。张立辰谈及恩师时目光灼灼：“你看这幅竹枝的用笔，就是陆先生独创的‘螺扁体’，每一笔都是书法与画意的交融。”

“把脉问诊”第一课

1960年秋的浙江美院教室里，陆维钊的教学从一场特殊的“诊断”开始。“他让每个学生当场写两幅字，不限内容，只为看透我们的‘笔性’。”张立辰回忆起自己当年用近乎颜体的字体写下了“祖国万岁”四个字，陆先生看完以后觉得用笔胆子不小，但是笔画过于肥大，缺少筋骨。开完这份“诊断书”后，陆先生还为张立辰开出“药方”——临柳公权《玄秘塔碑》，“柳体如剑，专斩虚浮之气”；而班上另一位用笔纤弱的女同学，却被要求临摹颜真卿的浑厚楷书，刚好跟给张立辰开的“药方”相反。由此，也看出陆维钊先生因材施教，他会针对每个学生不同性格和特点，用传统经典书法的用笔来改造学生的不良习惯。

“同时陆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临经典，他所指的经典就是过去原拓的碑帖，或者宋以前的拓本，它们能够保留这些大书家的原本精神。陆先生常会带我们到杭州西湖湖滨路上一家专门经营书法字帖的店里去挑选。我一直临写了三年《玄秘塔》，后来对于柳公权的笔法和字的间架结构才有所理解。快毕业时我又临了一段时间《云麾碑》。《云麾碑》笔底特别地秀润，但是笔力强健，字的间架结构很奇绝、有气势，这对我后面的创作受益很大。”

科学精神与守正创新， 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金铮（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

陆维钊先生的历史贡献： 科学精神与守正创新

陆维钊先生的历史贡献在于，其一是科学精神，其二是守正创新。这两点也是基于沙孟海先生在评述陆先生书法中讲到的，他说陆维钊先生的两大贡献，一是开创了高等书法教育，二是创立了螺扁书。

科学思维的建立是陆先生通人之学的核心，起步于南高师。那时，史学是陆先生的学术版图的中心，而不是我们现在认为的国文。我们要特别关注陆先生在思想报告中讲到的新文化运动对他的影响，他有一句话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结果弃文学理，以为理实用，文空洞……但终于在毕业前，又回到了文……但重理的心情尚未改变，以为学文也要走切实的路，应该看重整理国故，整理国故是科学方法，是切切实实地对待学问，这样才不是空头文人”。所以，我们看到陆先生大学五年的学术结构，第一年是国学，其后三年从竺可桢先生学习气象地理，这赋予他“科学的头脑”，最后一年才随吴梅先生学文。这种文理兼备的科学训练，为他此后艺术实践的长期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他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中等中国历史教科书编辑商例》（刊发于《史地学报》）就是以史学学养浇灌的成果。

这种学术背景和科学训练，同样投射到陆先生的艺术中，而且是“艺术—科学”共进。如《中国书法》一书中，陆先生对书法的理解与学书的方法，以精简雅训、条分缕析的方式进行呈现，初步建立了书法的学科框架。1962年开始开办书法篆刻专业，陆先生在课程设置、教师延聘工作中都显示出他对专业的科学理解，赋予薪火相传的使命。1979年的暑假，他为首届研究生手订的《教学

纲要》六十条，也是他“以次叙列”的史学方法在书法教育中的具体投射。

融贯文理，科学艺术结合，陆先生秉持的是“整理国故”的实证精神，以严谨的治学态度，推动传统艺术向现代学科转型，也成就了他的创新突破，使传统书画艺术在新时代焕发出理性的光辉。

重视创新是陆先生一直以来的艺术主张。他生前曾经讲过，将来书法有可能坏在创新上，而他自身的书法艺术却一直走在创新的大道上。他批评的是不守正，太野、急于求成，所以他的创新是有前提的，最为突出的是螺扁书体。这种对篆隶书的融合，从50年代的发端到70年代末期的成熟，花费了近三十年时间，沙孟海先生盛赞这是一种全新的书体。

陆先生对创新的理解，体现在不同领域，如谈到黄宾虹先生的画，他就赞叹“长处在于能创造”，基于传统基础的深厚、较高的文化修养还有行万里路这样三个方面的特质。还有，陆先生在《题孙正和印稿》有诗句“薄古方能见厚今”，这可以作为他创新的宣言。指导韩天衡刻印，陆先生总是围绕着创新，他有几句非常经典的话，“而不要放小脚式的不尴不尬的创新”，“必须创新，不过创新难于仿古，不必期其速成，水到渠成。熟能生巧，此不必然也”。另外，跋韩天衡印迹当中有“惟有新而不野，斯能推陈出新”。在生命的最后一年，陆先生给陆抑非先生的花鸟画作序又讲到“意欲其新，不新则苟”，点明了工笔花鸟画的方向等。这些都传递了陆先生对创新的鲜明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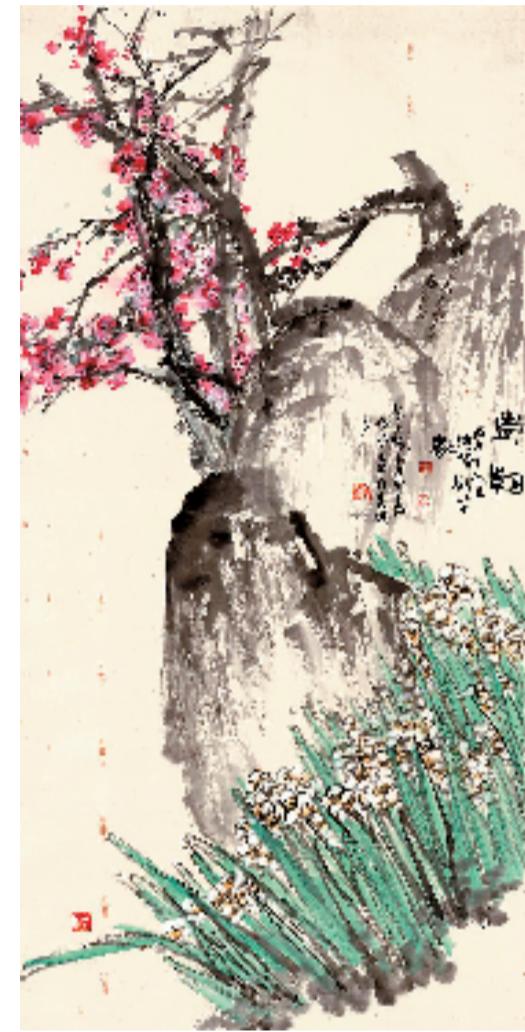
我们也从陆先生的实践中找到了这种轨迹，比如在螺扁书探求的开始，陆先生参照的范本居然是雅正的王澍《千字文》本，他是立足于王澍篆法的“三要”，假借王

砚池边的师道温度

砚池之畔，陆维钊的师道温度同样令人动容。姜宝林忆述陆维钊时说道，先生一生都是谦虚、谨慎、低调，关起门来做学问。他的治学态度不仅成就了他个人的卓越成就，更深深影响了我们这一代学子。

“我是1962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现为中国美术学院），陆先生给我们上书法篆刻和古典诗词，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非常严厉。比如，先生要求每日晨课第一件事就是洗砚台，在那个没有现成墨汁的年代，这样的仪式显得尤为庄重。若作业中稍有瑕疵，无论是多余的墨迹、皱褶的纸张，还是其他任何不洁之处，次日课堂上必将迎来陆先生的严厉批评。当时，我们心中或许有过不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领悟到陆先生良苦用心背后的深意：洗净砚台磨新墨，实则是磨去浮躁，让敬畏从笔尖生根。”这份敬畏，不仅是对技艺的尊重，更是对文化的传承与发扬。姜宝林表示，如今回想起来，我们无不感激先生当年的严格要求，让我们打下了扎实的知识与技能基础，为日后的学术道路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他既是严师，亦是慈父，课上严厉严肃，课下对学生却是温和体贴。张立辰回忆道，当时有同学买不起砚台，陆先生就到家里面拿一个大砚台给学生用。学生有困难，他都耐心相助。“陆先生和潘天寿先生，包括其他几位老先生都有这个特点，就是自己做学问做得很高很深，并一心为民族文化、民族艺术的传承发展教学，所以他们都自称‘教书匠’。我们受他们影响，也要做‘教书匠’。如今我们续着先生的砚田，才懂‘匠’字里藏着多少敬畏。”



陆维钊 岁朝图 纸本 140×69cm 1978年 家属藏

澍的“正宗”与“正步”，在不断地寻求突破与创新的进程中，时时对照的是“宗”与“正”的根本。所以，他在创新的道路上，是不离“古”地穷源竟流，寻求字形塑造的可能性。

“创巨痛深”的悲情人生

陆先生的一生是非常波折的。助教一职的失去，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前不久与章祖安先生谈及此事，他对我说，陆先生生前讲到此事时用了“创巨痛深”四个字，如此悲怆。他的表妹、妻子、长女相继离世，亲人离世的痛，使他度过了相当长一段苦难日子。晚年“书一纸，无他技”这样的感叹，更是其文人理想的一种失落表现。

陆先生今天的崇高地位，在其生前其实是没有得到认可的。编纂年谱中我们查阅到他的档案资料显示，从1942年“上海圣约翰大学副教授”开始，他当了四十年的副教授。而他临终的那一天，浙江美术学院的学术委员会才通过讨论，拟提升他为教授。学校上报省委教育卫生部后，因为“已病故”，“不能再提升为教授”，申报材料予以退回。后经请示省委领导，才得以“追认”。这份档案材料静静地躺在了美院档案室内，它以无声的语言，诉说着历史的真实，也让我们对陆先生的悲情人生有了更深的感慨。

陆先生是中国近现代艺术星空中一颗独特而璀璨的星星。他将诗书画印融于一体，又以文理兼修、科学思维重构传统框架。从史学新锐到现代书法教育的奠基人，从书法业余活动到晚年螺扁的开宗，他的艺术的求索之路始终交织着艺术灵性与理性思辨的光辉。科学精神、守正创新，是他给我们的宝贵的遗产。（文章有删节）